

第一辑

我的爷爷郁达夫

我的爷爷郁达夫

我的爷爷郁达夫我从来没有见过，当我 1949 年来到人世，我的爷爷早已于 1945 年 8 月 29 日被日本宪兵杀害在苏门答腊岛上 当时他还只有 48 周岁。

但对我的爷爷一点也不陌生，甚至还觉得挺亲近的。

当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时，记得富阳老家的堂屋中挂着一幅爷爷的放大照片，下面写着“爸爸的遗像”几个字 大概是我父亲的手笔。每逢寒暑假我回到富阳老家陪伴我奶奶，一天到晚出去进来不知要从堂屋中穿过多少回，渐渐地，我的爷爷就刻在了我心中，再也不会抹去。

我父亲是长子，我是父亲的长女，大人们说话我喜欢站在一旁默默地听。从我奶奶，从我爸爸，从我众多的叔伯姑妈的谈话中 我经常听到“郁达夫”这个名字。他们讲的人和事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虽然还很难理解，但我似懂非懂地记住了不少，以至许多年以后，我从书籍当中或从某个人的资料当中看到某人某事，还会记起小时候我曾听见我奶奶，我爸爸，我叔伯姑妈曾经对此人此事怎样怎样讲过。听得多了，难免将一些人和事，与脑海中

已有的爷爷的形象连结在一起，静态的爷爷就开始在我脑海中活动。我想像着爷爷是如何的音容笑貌，想像着爷爷是如何地和某人交往，想像着在某件事情当中爷爷又该如何如何。

长大了，会读各种文学作品了，就费尽心机地将爷爷的全部作品去找来，看了小说看散文，看了诗词看译文，这一看不得了，一个鲜明生动有血有肉的爷爷，在我心中复活。原有的外部形象虽还没有改变，但赋予这个形象的内涵却有了崭新的意义。我开始理解他的思想，他的性格，他的喜怒哀乐，他的多愁善感。于是，我把自己一点一滴的感想记录下来，成了这本书中的文章。

爷爷与奶奶孙荃

天刚蒙蒙亮，整个小镇还沉浸在睡梦中，一顶晃晃悠悠的风凉轿子，从富阳城西门出来。轿子上的座椅是用藤条编成的，两侧及椅后皆围着白纱布做的帷幔，风吹帷动，飘飘欲仙，风凉也就在其中了。坐在风凉轿上的，是一位面目清秀、神采俊逸的青年，身着西装，足登皮鞋。他就是我的爷爷郁达夫，一个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的官费留学生。乘着一大早的凉风，他要赶到三十里路外的乡村去，向自己的未婚妻——也就是我的奶奶告别。昨天，1917年夏历七月十一（公历8月28日）他刚和她订立了婚约，而五天以后，他又将起程去日本继续他的学业。

我奶奶原名孙兰坡，小字潜媿，1897年夏历九月二十一日出生于浙江富阳大青宵井下台门，比我爷爷郁达夫小一岁。

在宵井，我奶奶的孙家算得上是第一户的大姓人家。如果顺着《孙氏宗谱》追溯上去，则一直可以寻根到三国吴大帝孙权的祖父孙钟。相传孙钟是富阳孙洲人，后因出了孙权，孙洲遂改名王洲。孙钟的后代支脉繁衍，除王洲以外，还有好几个分支散住富阳各地，如龙门孙家、场口孙家、春建下唐孙家、宵井孙家等。

等。我奶奶则是宵井孙家的女儿。

开明人家 出众才女

我奶奶的父亲名叫孙孝贞，他是当时山村中一个知书明理，颇有远见卓识和魄力胆量的乡绅。本来，守着祖上传下来的那份家业，他满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，不用操什么心，也不用费什么神，平平稳稳，有吃有穿。但他偏不肯如此，他要成一番事业，有一番作为，似乎遥远的孙家祖上不愿碌碌无为，图谋成就霸业的雄心，到他身上还有着那么一点遗传基因。

宵井是个半山区，满山遍野都长着密密的毛竹。于是，他开始经营毛竹生意，后来又办起了以毛竹为原料的纸厂。在距宵井约五里地的贝山寺，开了四张白纸槽，雇用了六七十名工人，然后把做成的元书纸、土纸运到杭州闸口的纸行里去卖。

贝山寺坐落在半山腰，青翠欲滴的山峦，连绵不断彼此相连，一片片的毛竹林毗邻着长在这些青山上，看也看不尽，数也数不完。贝山寺的水又出奇地好，这一点，在我实地到过贝山寺后就有了更深的体验。那天我迎着三月的灿烂阳光，气喘吁吁地爬上贝山寺水库的大坝，一眼望见水库里的一泓清水，碧波荡漾，就像一面明晃晃的大镜子，那水的颜色，真格称得起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！

山清水秀，孙孝贞得此地理位置之便，再加上白纸师傅的精工细作，贝山寺出产的白纸很受沪杭一带纸行的欢迎，孙孝贞因此赚了不少钱。

有了钱，孙孝贞并不像有的乡绅那样吃喝嫖赌，他是个看重文化的人，尽管他自己的文化并不高，但他舍得将白洋用来培养子孙读书。我奶奶的大哥是清末秀才，弟弟和侄儿（她大哥的儿

子)都是日本留学生。孙孝贞还热心公众的教育事业,在自家厅屋上办了一个私塾,从富阳城里请来了教书先生。从此宵井下台门附近的几个自然村 诸如上台门、陈家、黄泥塘等的村童 都可以不必走很远的路,就近到孙家私塾来读书。也因为有了这个家办的私塾,我奶奶才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,学会了识字作文。这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,远离都市的乡村女孩子中,实在是很少的,不能不感谢他那位与众不同的父亲!遗憾的是,当时富阳这个小县城里,无论私塾或洋学堂都不招收女学生,因此我奶奶在家塾里读了几年书后便只能失学在家。但好学不倦的她还是经常找书来看,她特别喜欢吟诵唐诗,那些宫妇怨女的悲叹曾使她生发出无限的感慨!遇上有疑难的地方,她就向自己的大哥孙伊清请教。

当然,传统的女子教育还是必不可少,女儿以后出嫁是要去别人家做媳妇的,因此在家做姑娘时就要严格训练,免得将来被人嗤笑!

我奶奶的女红在宵井一带是有名的。她绣的花,针脚又细又密,颜色也配得活。直到她晚年,我还在箱子底里看见她年轻时绣的枕套,无情的岁月已经给这些绣品蒙上了一层灰暗,但当年的风姿仍依稀可辨。她做的鞋,又耐看又结实,我小时候一直穿奶奶做的鞋。新鞋穿在脚上,走到哪里,哪里的大妈大嫂就盯着看,还要我把鞋脱下来让她们仔细瞧瞧。我奶奶还有一手绝活——裹粽子。粽子是中国南方特有的一种食品,在富阳很盛行,一般的人家逢年过节都喜欢吃。我奶奶裹的粽子一个个大小很匀称,剥开粽箬来,箬壳上一粒米也不会粘,里面的粽肉有棱有角。富阳地方有娶亲时男方挑一担粽子到女家去的风俗,这样的粽子当然比一般家常吃的粽子裹得更为讲究,我奶奶老是被请去裹这种娶亲粽。

因此，我奶奶出嫁前，是她们那一带地方最出色的姑娘，又能干又有文化，凡是见过她的人都说：能有这样的姑娘做媳妇，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！

祖上姻亲 交往密切

郁孙两家原是老亲。据《郁氏宗谱》记载，郁家祖上有个郁宸章曾与宵井下台门的孙天佑，从少年结义一生，情同手足，胜若同胞兄弟。之后，他们的后代遵照他们两人临终时的遗训，共同在富阳屠山购得一块坟地，建造坟茔，栽培荫木，将两位先人的灵柩合穴安葬。

自这以后，郁孙两家又因婚配成为姻亲。也据《郁氏宗谱》记载，郁达夫祖上曾有两代人娶的都是宵井下台门孙家的女儿。郁达夫的母亲陆氏，娘家就在富阳大青栗园，离宵井下台门约五里路。因此，陆氏对郁孙两家祖上的姻亲关系应该说是清楚的。

此外 郁孙两家之间 还有一层郁家是“庄书人家”的关系。

“庄书”本来是晚清时代江南一种民间管理田赋的制度。每个县被分成若干庄(约与今日的乡相仿)庄内的田、地、塘、宅、山等等所有权的登记造册都由民间专户保管，这种登记册称“庄书”保管的专户称“庄书人家”。除保管田产登记册外，庄书人家也经管所有权买卖过户，向当地政府申报各户税赋及变更等事项。这种田赋管理制度的形成和得以存续，大约和那个时代的交通不甚便利相关。富阳多山，边远山乡的村民赶到城内，往往错过了衙门的办公时间，只得委托城内相熟的人代为办理。久而久之，不但偏远的山乡，即使是离城较近的田庄，买卖过户手续也委托一位专人，这就成了最初的庄书和庄书人家。

郁家有一部半庄书的管理权，是祖上遗留下来的。

孙家至孙孝贞时，因做毛竹生意，后来又开办纸厂，买卖山林田地的事情就较以往来得频繁，每一次买进或卖出都要进城到郁家办理过户手续，经常就餐留宿于郁家。每年秋收之后，庄书人家要向买卖田地较多的大户、中户收取所谓“秋丰谷”若干斗、石，作为代理庄书事务的手续费。这时，郁家也少不得要从城里去到宵井孙家，有时就在孙家吃饭或息夜。这样一来二往，两家彼此之间经常走动，显得越益密切。

不贪钱财 订下婚约

郁达夫 1896 年出生时郁家和当时县城里“既无恒产又无恒业”的“大多数的百姓”家庭相比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当时郁达夫的父亲郁企曾还在富阳县衙门户房当小差事（司事），每月有薪俸，还有兼行医的收入；祖遗的十多亩薄田，自家种了六亩左右做口粮，余下的就出租给别人耕种；再加上每年作为“庄书人家”收来的“秋丰谷”大约可以供全家半年的口粮。因此，在自传中郁达夫称自己的家庭为“中产之家”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郁达夫三岁即丧父。一家老少六口（祖母、母亲、两位哥哥、一位姐姐和郁达夫）两代寡妇。郁达夫曾说：“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。”可想当时生活的艰难。郁达夫的母亲陆氏为延续“书香世家”的传统咬紧牙关竭力培养三个儿子上学读书，并且三个人都上了高等学府，其中长幼两子还去到了日本留学。为此，郁家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把三间住屋，剩下的六亩薄田和一部半庄书全部抵押出去而靠借债度日。

与此同时，宵井孙家的日子却蒸蒸日上，一天胜过一天。到我奶奶长成大姑娘待聘时，她的父亲孙孝贞已成为整个大青乡的“首富”。按照孙孝贞的身份、地位和家庭状况他完全可以为

自己钟爱的女儿选择一户比较富裕的亲家。但当介绍人陈凤标上门来为郁家的小儿子郁达夫提亲时，他明知郁家穷得很，不属门当户对之列，却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。这个答应不仅囿于一种“亲上加亲”的考虑，更显示他对郁家的中意。他中意郁家“书香世家”的传统，他中意郁家勤奋好学的家风，他更中意郁家三个儿子个个肯努力求上进。孙孝贞虽然很有钱，但他选择女婿，贪求的是“才”！

1917年夏历七月十一（公历8月28日）我奶奶与我爷爷订了婚，这一年我爷爷22岁，我奶奶21岁。

鸿雁传书 相思千里

订亲像一根红线将两颗青年人的心连在了一起。从此飘泊海外的游子，除了牵肠挂肚于家中的母亲和老祖母外，又平添了一份对未婚妻的相思之情。1917年10月16日，一首《为某改字曰兰坡名曰荃》的七绝诗，自日本漂洋过海飞到我奶奶手中：

赠君名号报君知，两字兰荃出楚辞。
别有伤心深意在，离人芳草最相思。

从此，我奶奶便改名孙荃，字兰坡。

我爷爷在海那边的岛国上相思，我奶奶又何尝不在海这边的山村中相思呢？苦苦的相思之情聚积得太多太满，难免发乎其外，于是就凝成了笔端的诗篇。她有一首《秋闺之二》云：

风动珠帘夜月明，阶前衰草可怜生。
幽兰不共群芳去，识我深闺万里情？

还有两首《有感》诗：

笑不成欢独倚楼，怀人望断海南州。
他年纵得封侯日，难抵春闱一夜愁。

淋漓襟上旧啼痕，难断柔情一寸根。
正尔愁心无托处，何堪梦里遇游魂。

愁 愁 愁 切莫愁白了头 曾闻‘少年不识愁滋味’，今日始知 若为相思故 少年亦添愁。

今天，重读我奶奶的这些爱情诗，似乎并没有什么新鲜可言，但要知道，作成这些诗的时间距今已有七十多年。那时，在中国还是封建传统和封建意识都十分顽固的时候，特别对于女性来说，封建更是一种沉重的桎梏。我奶奶这么一个生长在穷乡僻壤，不曾进过新式的学校，也不曾呼吸过通都大邑的自由空气的弱女子，能如此大胆地用诗句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追求，对未婚夫婿的怀恋，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鸿雁传书，春去秋来，两人之间不断有诗词唱和，这对处于娴静的清闺生活中的我奶奶自然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和乐趣。远在东瀛的未婚夫婿曾为自己的未婚妻选诗助读，号称“神韵集”，选的大多是唐诗。其中有李德裕的《长安秋夜》：“内官传诏问戎机，载笔金銮夜始归。万户千门皆寂寂，月中清露点朝衣。”在此诗上郁达夫批注：“态度浓浓，想见宰相举止。后半首清寂怖人，予最爱此等写法。”他还劝我奶奶多读晚唐诗，并说了一番道理：“晚唐诗人以李义山、温飞卿、杜樊川为佳。试取李商隐《无题》诸作而读之，神韵悠扬，有欲仙去之概。世人以其过于纤巧而斥

之，误矣！诗必纤巧而后可，何过之有？！”（1919年8月6日信）

在远方诗师如此殷切的“函授”之下，我奶奶的旧体诗写作有了长足的进步。郁达夫在1919年8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接兰坡书附有诗四首其《夜雨》一首云……颇可诵也。”第二天他就给我奶奶写信：“来诗大有进境。‘无端一夜空阶雨，滴碎离人万里心’佳句也，已欲与文诗相抗矣！”郁达夫名文“文诗”指他自己的诗。1919年和1920年，郁达夫还把我奶奶的一首《有感》（本文前引之“笑不成欢独倚楼”）两首《寂感》夹在他自己的两组绝句内分别寄往杭州《之江日报》和日本的《太阳》杂志去发表，竟全然乱真：

朔风凛冽夜沉沉，兽炭书灯识此心。
君去吴头依楚尾，知音千里抱孤琴。

深阖静坐觉魂销，梅影横窗气寂寥。
无奈夜长孤梦冷，书灯空照可怜宵。

郁达夫还帮助婚前的孙荃学习书法。在我家现存的郁达夫早年留日家书中，有一封1919年夏历七月八日的信，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工整，大小左右间隔匀称，看得出是花费了一番心血写成的。它是我爷爷写来供我奶奶闺中习字临摹用的，录于兹：

卒业考毕后，久欲作书告近状，卒以俗务，故迁延至今。文已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卒业，下半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，此番来即为预备入学也。树祺日夕从，客居亦颇不寂寞。所恨者他乡米贵，每食不得食梁

肉耳。刻北京长兄书来，谓十月间北京有高等文官考试，按考试条例，文当然有预试资格，十月间颇欲乘兴西游，只愁路费恐多，又不得不将先祖遗田典卖耳。梅子黄时，晴雨无常，汝起居亦佳适否？迩欲稍学书法，是以于日记书简之类不敢粗杂书。

郁 文

己未夏历七月八日

信中的“树祺”即我奶奶的侄儿（她大哥的儿子）当时亦在日本东京求学。信的首尾钤有两方印章：一为“从吾所好”；一为“我是春江旧钓徒”。

1920年夏天，我奶奶满怀着闺房中编织成的对未来的美好憧憬，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官费留学生郁达夫结为夫妻。她共养了四个孩子：龙儿、熊儿（郁天民——我的父亲）两个儿子和文儿（郁黎民）、胖妮（郁正民）两个女儿。除龙儿因病早夭外，其余三个孩子都在极困难的条件下，由我奶奶抚育成人。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我奶奶先是读到我爷爷写的《毁家诗纪》，后来又知道我爷爷已在南洋为国殉难。以后的几十年，我奶奶经常回想起和我爷爷在一起的情景，生活在对我爷爷的回忆之中，一直到1978年3月29日她82岁高龄时离开人世。她是处在那个时代的女性，既接受那个时代赋予的恩惠，也因袭那个时代给予的包袱，她和那时代的许多女性一样，正处于新旧交替之中。

1995年2月

郁达夫与胡适初次会面

1919 年秋，郁达夫刚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，升入东京帝国大学。他因“北京长兄书来，谓十月间北京有高等文官考试”（见郁达夫致孙荃信，1919 年夏历七月八日），就于 9 月 14 日回到富阳 23 日夜半抵北京。10 月 13 日他给当时在国立北京大学文科任教的胡适先生写了一封信，表达自己想与胡适先生“面会面会的愿望”（见《郁达夫文集》第 9 卷），他在信中谈到此番从国外回来“并非为求做官”；还没有看见祖国的首都过”是原因之一，但更重要的“恐怕还是想去见见那几位人物的那一种念头，居其大半呢”。那几位人物”郁达夫是借用了美国 18 世纪的散文作家、诗人爱默生（R. W. Emerson）的一段话来表达的，指当时在提倡新文学新思想的杂志上经常发表文章的几位撰稿人，其中之一就是胡适先生。

周作人先生在《知堂回想录》中曾抄录“一向对于北大没有好意”的段祺瑞派报纸《公言报》，1919 年 3 月 18 日发出的一个长篇记事——《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》。其中写道：“……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子民任校长后，气象为之一变，尤以文

科为甚。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，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，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，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，学生闻风兴起，服膺师说，张大其辞者，亦不乏人。……自胡适氏主讲文科哲学门后，旗鼓大张，新文学之思潮亦澎湃而不可遏，即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，而于其所授受之哲学讲义，亦且改用白话文体裁。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，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，以张皇其学说。“可见在 1919 年的青年学生心中，胡适先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新派人物。

而 1919 年的郁达夫，身在国外，却时刻注视着祖国的变化，不但赞同胡适等新派人物的主张，而且认为胡适等人的“那一番文艺复兴的运动，已经唤起了几千万的同志者”。他自己就是这几千万中的一个。迄今为止发现的郁达夫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文稿——《两夜巢》就创作于 1919 年 2 月。因此，东京帝大的青年学生郁达夫，对当时的胡适先生有那么一种钦慕乃至崇拜的心理，是一点也不奇怪的！

那么，郁达夫想与胡适先生会面的愿望，到底有否实现呢？据郁达夫 1919 年的日记记载：10 月 15 日。“接胡适招往教书。”10 月 18 日：“午前 10 时访胡适之于其家，谈一小时即别去。胡问予现在美国否？盖惊予之能操英语也。到日本后允以帝大新学制及此次还乡之印象记寄之。”

不妨做这么一个推断：10 月 13 日夜 10 时郁达夫写好致胡适先生的信。14 日一早寄出。胡适先生在收到郁达夫的信后，当即函复。15 日郁达夫就收到胡适先生的回信。18 日上午 10 时，郁达夫到胡适先生家与先生谈话一小时。

对于一个自己并不认识的青年学生，而且据郁达夫推测，当时“大约不认识你（指胡适先生）的青年学生，唐唐突突地写信给你的人，也一定不少的了。”（见郁达夫致胡适信，1919 年 10 月 13

日)，胡适能马上给予答复，并招他前往谈话一小时。这不能不使郁达夫感到欣喜，遂了他此番从东京回来的心愿。以胡适先生当时的名望、地位，能以这样平易近人的态度对待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学生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1988 年 12 月

郁达夫的书缘

郁达夫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，买书、藏书、读书、写书，几乎终生与书打交道。

郁达夫买书的初次记录，是 1911 年他自嘉兴府中学回来过暑假，路过杭州，在梅花碑的旧书铺里买了一大堆书，并且因为在这一大堆书里，能读到《吴诗集览》、《庚子拳匪始末记》、《普天忠愤集》三部书而使那一年的暑假过得非常快活。在这半年以前，当他从高等小学堂毕业时，学校曾奖给他一本《吴梅村诗集》。这大约是一本选集，是他“平生专心研求韵律之始”。而《吴诗集览》所收的吴梅村的诗，则该比《吴梅村诗集》多而全吧？从目前所能看到的郁达夫早期诗歌中，不难看出在风格上受吴梅村诗的影响。

有了这最初的买书经历以后，他每到一个地方住下，就在这地方买书，留学日本、北京任教、寓居上海、移家杭州、福建就职，即使至远在海外的新加坡办报，后又到苏门答腊岛上的巴爷公务流亡，凡是住过的地方，无论环境如何不安定，有时甚至还有危险，都会因随地买书而很快积累起一批藏书。由于时局动